

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的文学世界建构方式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World in Haruki Murakami's *Killing Commendatore*

任 洁 (Ren Jie)

内容摘要: 意识和隐喻是解读村上春树文学的两个主要概念。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不仅有意在“意识—理念—日本贵族—骑士团长”之间建构逻辑联系,而且又将其解构,导致能指脑概念与所指脑概念表层关系的断裂。在同一伦理环境中,能指脑概念与所指脑概念的配对关系因个体意识而失去稳定性,形成了超越伦理环境限制的更加自由的配对空间。同时,村上春树还通过地上→地下(…地下)→地上的场所转换,展现隐喻意义的流变性特征,继而强调意义生成过程中隐喻主体的决定性作用。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用意识和隐喻校正之前的诸多伦理思考,赋予其新的伦理内涵。这也是村上春树建构村上式文学世界的独特方式。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意识;隐喻

作者简介: 任洁,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日本近现代文学、东亚社会与文明研究。本文为202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重点课题“‘四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号:22NDJC001Z】、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和浙江大学“重要国家和地区研究”专项项目“环波罗的海国家语言与文化研究”【项目批号:S202202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World in Haruki Murakami's *Killing Commendatore*

Abstract: Consciousness and metaphor are the two main concepts for interpreting Haruki Murakami's literary. In *Killing Commendatore*, Haruki Murakami does not only intentionally construct a logical connection of “consciousness—idea—Japanese nobleman—commendatore,” but also deconstructs it, resulting in a breakdown of the super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brain concepts. Within the same ethical environment, the pairing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brain concepts loses its stability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hus forming a freer space for pairing which transcends the limits of ethical environment.

Meanwhile, Haruki Murakami shows the rheological property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ce from aboveground to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then back to aboveground, and afterwards emphasizes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etaphorical subject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meanings. In *Killing Commendatore*, Haruki Murakami uses consciousness and metaphor to correct many of his previous ethical reflections and give them new ethical connotations. This is precisely the unique way in which Haruki Murakami constructs the Murakami-style literary world.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ruki Murakami; *Killing Commendatore*; consciousness; metaphor

Author: Ren Jie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East Asia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Email: renjie_85@163.com).

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下略称“村上”），1949年生，是至今仍活跃于日本文坛的多产作家。2017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騎士団長殺し』，下略称《刺杀》）是村上最新一部“分量十足的长篇”¹。与市场热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刺杀》因与村上过去作品之间存在“类似”²而在评论界毁誉参半³。持积极评价的一方认为，《刺杀》是一部“调动了村上春树迄今为止所有故事形式和道具的集大成之作”；而持批评态度的一方则认为，村上“已失掉了他的魔法”，“作品中除大量的信息以及如同‘维基百科’般的历史性描写之外，丝毫看不到主人公的成长”。⁴不论题材、主题、人物、环境、情节，还是结构、语言等，《刺杀》与村上过去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类似。村上认为，作家“每隔几年重复一次”是极为正常的事情，这或可成为支撑创作的“精神筋骨（backbone）”（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树 128）。但是，《刺杀》对之前作品的“重复”最早可追溯至村上的

1 参见 新潮社宣传语 < <https://www.shinchosha.co.jp/book/353432/>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井関優花：「村上春樹作品における〈色を持たない登場人物〉像について：『色彩を持たない多崎つくると、彼の巡礼の年』『騎士団長殺し』を中心に」、『富大比較文学』3（2020）：1。

3 参见 平野芳信：「村上春樹『騎士団長殺し』論：即身仏／ビーフジャーキー」、『近代文学試論』56（2018）：85。

4 See Daniel Morales, “‘Killing Commendatore’: Murakami’s latest lacks inspired touch of earlier works.” *The Japan Times*, 1 Apr. 2017 <<https://www.japantimes.co.jp/culture/2017/04/01/books/book-reviews/killing-commendatore-murakamis-latest-lacks-inspired-touch-earlier-works/#.W0KnAtIzY2w>>.

初期作品，而且贯穿整个创作过程。这种类似带来的“似曾相识感”（Déjà-vu）尽管可以帮助读者“更容易理解小说”，但从根本上说是村上力图构建“作为有机体”¹的村上式文学世界的独特方式。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运用互文（自互文）、改写、隐喻等方法，村上将毕生创作经验整合于《刺杀》之中，建构村上式文学世界，传递村上式思考。

一、理念显形：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对抗

《刺杀》以第一人称讲述肖像画家“我”与妻子分手后借住在朋友的父亲雨田具彦的老别墅期间发生的奇妙故事。“显形理念篇”（顕れるアイデア編）²是第1部的标题。这里的“理念”分别对应日文“アイデア”³和英文“idea”。有学者认为，《刺杀》与柏拉图的理念论（Idealism）不无关联。⁴村上果断否认这种看法，认为选择“理念”完全是出于对该词“音的回响”的偏爱。理念的内涵大致与“意识”相近，与“无意识”相对。⁵在《刺杀》中，无形的理念显形为骑士团长，一个从雨田具彦创作的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绘画中走下来的人物。据骑士团长自述，他虽与画中身着日本飞鸟时代⁶服饰的贵族外形相似，但并无实际关联。正如村上借用“アイデア”指代意识一样，如果骑士团长“以木乃伊形象出现”（1:259）⁷，也不无可能。“我”还发现，绘画中描绘的内容与雨田具彦喜爱的歌剧《唐璜》（*Don Gioxanmi*, 1787）中的一幕类似，都是描绘或讲述年轻男子刺杀老年男子的场面⁸。在意大利语版本的《唐璜》中，老年男子被指称为“II Commendatore”（1:73），译成日文即“騎士団長”⁹，“我”由此推测显形的骑士团长以及画中的日本贵族可能来自《唐璜》。骑士团长并不赞同，认为“倘若需要称呼名字，称作骑士团长并不碍事”（1:258），而且这个假定形象“下次是什么无从得知”（1:259）。

1 参见 迹上史郎：「かひがひしからぬ『諸君』：世界模型としての村上春樹『騎士団長殺し』」，『近代文学試論』56（2018）：97。

2 英文译为“The Idea Made Visible”。

3 日文“アイデア”中文译为“理念”。

4 参见 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树：《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村上春树访谈集）》，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5 参见 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树：《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村上春树访谈集）》，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111-112页。

6 飞鸟时代是古代日本的一个历史时期，开始于公元592年日本第一个女天皇推古天皇就位，终止于公元710年迁都平城京，上接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

7 本文有关《刺杀骑士团长》的引文均出自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下文只标记部数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8 在莫扎特歌剧《唐璜》中，浪荡公子唐璜要对美貌女子非礼，女子的父亲骑士团长赶来相救而被唐璜当场刺杀。

9 日文“騎士団長”中文译为“骑士团长”。

小说有意建构“意识—理念—日本贵族—骑士团长”的逻辑联系并将其解构，从而导致能指脑概念与所指脑概念表层关系的断裂。骑士团长强调，显形为日本贵族并非出于个人选择，认为他“不过是照出人心的镜子”（2:230），其形象会因看他的人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理念在“我”的眼中显形为骑士团长，在雨田具彦眼中可能显形为其他他“想看的東西”（2:230），如1938年维也纳留学期间他计划刺杀的纳粹高官。在同一伦理环境里，能指脑概念与所指脑概念之间的配对关系因个体意识的介入失去了稳定性，由此形成了超越伦理环境限制的更加自由的配对空间。然而，在未被意识化的古代社会，人们依据由巫女或行使巫师职责的“王”作出的预言进行判断，个体意识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随着城市的出现和社会体制（system）的形成，无意识的行为逐渐成为有意识的行为，作为无意识显形结果的巫女失去了原有价值。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而是作为女巫替身的“集体意识”的出现。在意识化之后的社会里，它显形为国家、制度等“刚性体制”（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232）。骑士团长告诉“我”，在理念世界里不存在第二人称单数，即只有“你们”没有“你”。如果作为理念显形的体制是由“我们构筑的东西”（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59），那么为何体制能站在统摄“我们”的立场发出“你们”应如何去做的指令？

从道德层面说，一如“所有东西都有影子”（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树 232），体制亦包含无法消除的恶的部分。追根溯源，导致体制之恶的原因是个体意识的缺失，或者说个体对集体意识的无意识。村上曾公开谈起个体意识缺失的可怕之处：

〔……〕多数德国人在战争结束之初把自己也转到了受害者一边，说自己也被希特勒骗了，被夺走了心影，以致倒了大霉——大体只有受害者感觉剩了下来。日本情况也大同小异。日本人心里，自己也是战争受害者这种意识很强，以致自己是施害者这一认识无论如何都要滞后。〔……〕说来说去，最后在自己也受骗上当了那个地方不了了之——天皇不坏，国民也不坏，坏的是军部，就像这个样子。这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可怕之处。（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65）

意识化之后的世界并不存在足以保障远古无意识有效运转的空间，更无法消除个体对“超越时代流淌在血管里”的“神话性”（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74）的依赖。集体意识所具有的“神话性”恰恰满足了个体对“简单、直接、明快且有力”（村上春树，『村上春樹雜文集』 27）的脑文本（brain text）¹

1 脑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是人类在发明书写符号以及纸张之前储存信息的文本形式，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于世界客观事物的感知、认知、理解和思考。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2（2013）：8-15，以及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2017）：26-34。

的本能需求，这导致个体倾向于用某一“集体伦理（Moral）”替换掉“个体伦理（Maxim）”。

然而，将意识与无意识、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混淆起来，是极其危险的事情。当集体意识显现出非理性特征时，个体很容易沦为非理性集体意识的工具。非理性的集体意识会“把人诱入四面合围的场所，在那里边彻底洗脑”（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237）。纵观日本近代发展史，天皇制演变成军国主义，民主主义运动发展为残害同伴的联合赤军事件就是例证。所以，必须“杀死”骑士团长¹，“杀死”从未被意识化的世界中穿行而来的无意识，以此唤起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刺杀》中，雨田具彦将受纳粹迫害的经历置换成富有象征性的日本绘画，将纳粹高官设置为飞鸟时代年老男子的形象，并在绘画叙事中将其杀死，然后又借“我”之手在隐喻世界中将其杀死。其实，“我”也不确定杀死的究竟是什么。它可能是纳粹高官，也可能是“在南京城内把日本刀递给弟弟令其砍掉三名中国俘虏脑袋的年轻少尉”，还可能是“催生这一切的更为本源性的邪恶的什么”（2:235）。或许如骑士团长所说，只是“之于诸君的我这个理念在那里气绝身亡（……）世界并不会因之有所改变”（2:224）。即便如此，“我”也必须将“杀”付诸于行动。此时，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与作者合二为一。作者力图以“故事这一版式”进行“有效反击”（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树 236）的创作意图，促使着故事中的“我”最终杀死了骑士团长。

二、隐喻流变：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较量

《刺杀》第2部的标题是“流变隐喻篇”（遷ろうメタファー編），英译为“The Shifting Metaphor”，“隐喻”很自然地成为了小说除“理念”之外的另一关键概念。实际上，隐喻是村上文学惯用的修辞手法，构成村上文学“以混沌的语言替换混沌的现实”²的文体特色。相较于其他作品，《刺杀》中的隐喻意义是“流变”的。村上认为，“固定的分析，必然哪里含有误差，有时候是可以容许的误差，有时候则可能是极其危险的误差”，所以“尽可能不去碰静态分析（……）我努力在动态中观望流动性事物”（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184）。换言之，有必要在流变中把握流变着的隐喻。那么，何为流变？《日本国语大辞典》有三种解释：1、所居场所改变；2、变心；3、状态改变（如盛衰、变色、花落等）。³其中“所居场所改变”的解释，符合“流变”在《刺杀》中的意义所指。小说中场所的转换，主要表现为地上→地下（…地下）→地上，即在现实世界与隐喻世界以及不同隐喻空间之间转换。场所的转换导致隐喻意义从一种跳转至另一种，表现出流变性特征。

1 小说名即为“杀死骑士团长”。

2 参见村上春树：『少年カフカ：村上春樹編集長』，東京：新潮社，2003年，第734頁。

3 参见『日本国語大辞典』縮印版第一卷，東京：小学館，1986年，第1379頁。

《刺杀》中的隐喻始于一个自称“隐喻”的“长面人”。与自称“理念”的骑士团长类似，长面人也是从雨田具彦的绘画中走下来的人物。画中的长面人从地面的封盖中“探头探脑”（1:74）地钻出来，“姑娘也好仆人也好都没察觉”（1:72）他的存在。长面人还表现出一副想要“从个人角度把我诱去地下世界”（1:75）的样子，以至于看画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事实上，长面人确实起到了将“我”从地上（=现实世界）引入地下（=隐喻世界）的作用。当被问到“到底是谁、是什么？”（2:238）的时候，长面人回答说他是隐喻，其职责是将“东西与东西”（2:243）联结起来。确切地说，长面人是隐喻在现实世界中显形的结果，他打开的正是从现实世界通往隐喻世界的入口。而且，在钻回隐喻世界之前，长面人有意将“我”正在寻找的女孩秋川真理惠，错称为“我”死去妹妹的名字“小径”。由此，地上世界的秋川真理惠与地下世界的小径连接在一起。隐喻（=长面人）通过意识（=秋川真理惠）唤起了“我”的无意识（=小径）。这种无意识仅仅停留在“地下一层”的位置，那里固然“也有例如受过父母、兄弟或其他人虐待、也就是受过精神创伤”的记忆，但《刺杀》“要去、想去的场所”在地下二层（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63）。

随着“我”的双脚迈入地下黑暗，故事发生的场所切换至隐喻世界。在隐喻世界里，“一切都是好像的东西（……）目力所及，归终都是关联性的产物”（2:270）。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具体实在均作为隐喻出现在隐喻世界里。例如，渡河前，无脸摆渡人向“我”索要的代价是现实世界中秋川真理惠的企鹅护身符；渡过河，摆在“我”面前的唯一出路是“我”和妹妹曾一起进过的富士风洞；洞穴里遗弃的旧矿灯恰巧与雨田具彦参与的学生地下组织的名称有关；为“我”引路的女孩是雨田具彦绘画中的那个“以惧怕眼神目击骑士团长被刺杀现场的年轻美女”（2:267-268），她还是《唐璜》中骑士团长的女儿唐娜·安娜，女孩对“我”说：

那条河流淌于有无之间。而且，出色的隐喻会让所有事物中隐含的可能性的河流浮现出来。犹如优秀的诗人会在一种光景中鲜明地演示出另一种新光景。不言而喻，最好的隐喻即是最好的诗。您不能把眼睛从另一种新光景上移开。（2:272）

在“出色的隐喻”世界（地下二层）里可能遇到“让人怀念的东西”（2:276），也可能不得不与某些“地痞无赖、危险的物种”（2:244）进行较量。这些“危险的物种”正是长面人一再提醒“我”留意的“双重隐喻”。何为“双重隐喻”？女孩解释说：“那是在您身上捕捉之于您的正确情思（……）很早就已住在您体内深重的黑暗中”（2:273）。那么，何为“双重隐喻”的双重性？这表现在：一方面，它隐喻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实实

在在的“恶”，小说中它显形为在现实世界里一直尾随“我”和情人的“白色斯巴鲁男人”；另一方面，它还隐喻了潜藏于“我”自身无意识中的“另一个自我（alterego）”（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树 106），或曰本能¹。本能在“愤怒与悲哀”²（1:249）的条件刺激下，以非理性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转换为想要作恶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我”在现实中用睡袍带勒住了情人的脖子，又在睡梦中勒住了与性伙伴走进旅馆的妻子的脖子。

“我”在地下黑暗的洞穴中不断穿行，场所随之快速转换。在这期间，作为理性象征的唐娜·安娜和妹妹的声音迭次传来，又消失不见，只剩下“白色斯巴鲁男人”叫嚣着：“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2:277）就在“漆黑漆黑的黑暗”即将把“我”“准确无误地掩埋”的紧要关头，“我”的理性意识开始发挥作用，使“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关联性的产物（……）光即是影，影即是光”（2:278）。邪恶的“白色斯巴鲁男人”实际来源于“我”自身，它以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³的形式存在，是“动物性本能的体现”，一旦“失去了约束，就会完全释放出来，真正变成邪恶的力量”（聂珍钊，《导论》46）。于是“我”摒弃杂念，将身体捅向更为狭窄的空间，最终从洞里钻了出来。不可否认，隐喻意义是流变的，但流变的方向由隐喻主体决定。

三、回归洞穴：村上文学世界的建构方式

在原著封皮上，小说名“刺杀骑士团长”中的“杀”字使用了斜体标记，这提示了“杀”字之于小说的重要性。“杀”也是贯穿村上文学创作的重要伦理线索。从《寻羊冒险记》（『羊をめぐる冒険』1982）中杀死隐喻非理性脑文本的“羊”，到《奇鸟形状录》（『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1994）中杀死象征绝对恶与暴力的绵谷升，再到《海边的卡夫卡》（『海辺のカフカ』2002）中的“杀父”与《1Q84》（『1Q84』2009-2010）中的“杀王”，村上通过设置“杀”与“被杀”的故事情节将文本内部人物、事件、时间、场所等要素有机串联，同时运用互文、改写、隐喻等方法将其他文本空间中的“杀”（如俄狄浦斯弑父、战争中的屠杀、宗教性杀戮等）汇聚于当前文本中，使之横向联系、纵向承继、相互指涉、彼此渗透，由此搭建起神话、历史与个人经验巧妙相融的文学世界。尤其重要的是，在《刺杀》中村上赋予“杀”以崭新意义，使之成为唤醒个体意识、促使个体在意识与无意识的隐喻空间中重新审视自我的媒介。

1 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受自我意识控制的条件反射活动，当无意识的本能转变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时候，以理性意志或非理性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7页。

2 结婚六周年纪念日，妻子毫无征兆地提出已有外遇，要求与“我”离婚。

3 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属于人身上非人的一部分。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5页。

意识和隐喻是解读村上文学的两个主要概念。就“意识”而言，从最初“青春三部曲”¹中意识到内部自我存在，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世界の終りとハードボイ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1985）《舞！舞！舞！》（『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1992）《奇鸟形状录》《天黑以后》（『アフターダーク』2004）中意识到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再到《1Q84》对封闭式集体意识的反叛；就“隐喻”而言，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对隐喻了脑文本的“心”的关注，到《寻羊冒险记》中对隐喻主体脑文本开放性与合理性的强调，再到《海边的卡夫卡》中对在隐喻世界中实施拟似性伦理犯罪的讨论以及《1Q84》中的“小小人”、“空气蛹”等，无不显示了村上文学内在的延续性和成长性特征。在《刺杀》中，对“意识”的关注从被动地反叛封闭式集体意识，发展至主动杀死集体意识，以唤起个体意识觉醒；对“隐喻”的关注从主张以开放性物语对抗封闭性物语，发展至强调隐喻意义的流变性特征，以及意义生成过程中隐喻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村上还通过互文与自互文的方法，将迄今为止文学创作中的诸多要素纳入《刺杀》的文本空间，如身份模糊的富豪²（《寻羊冒险记》）、空心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北海道之旅（《挪威的森林》）、神秘的地洞（《奇鸟形状录》）、个性少女秋川真理惠（《奇鸟形状录》）、妻子外遇（《斯普特尼克恋人》）、梦中的性交（《海边的卡夫卡》）、姓氏“色兔”（《没有色彩的多崎作》）、新兴宗教团体（《1Q84》）等。

村上曾将自己比作原始社会洞穴深处讲故事的高手。³“日落西山，外面黑漆漆的，又有吓人的野兽，大家都躲在洞里围着火堆”，于是故事高手出场了。他“讲得妙趣横生，大家都被吸引进去。或者悲伤，或者兴奋，或者一下子心头火起，或者被逗得放声大笑。饥饿啦害怕啦寒冷啦，不知不觉忘个精光”（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66）。写小说与在洞穴里讲故事类似，二者都力图把尽可能向善的东西、即使外部伦理环境改变也能长期流传的“好的故事”提供给接收者（receiver）。⁴

在很多情况下，善这个东西，理解起来咀嚼起来需要时间，觉得麻烦无聊的时候不算少。但是，“恶的故事”，总体上是被单纯化了的，直接诉诸人心的表层，剔除逻辑直截了当，容易接受。（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67）

1 指村上最初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分别是《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

2 指《刺杀》中的人物兔色。

3 参见 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树：《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村上春树访谈集）》，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66-68页。

4 这里的洞穴区别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村上曾明确表示《刺杀》与柏拉图理论并不存在关联；与“接收者”相对的概念是“感知者”（perceiver），二词来源于村上春树小说《1Q84》。

之所以善“咀嚼起来需要时间”，是因为“好的故事”的本质“在于寓意，在于比喻”，而“寓意和比喻是不应该用语言说明的”（1: 335），而是要通过发挥个体意识的能动作用在流变中进行把握的。一方面，因为隐喻意义只能存在于关联性之中，所以解喻活动不得不“听命于事象与表达的关联性”（2: 244），即外部伦理环境¹；另一方面，虽然隐喻意义是流变的，但流变方向由隐喻主体决定。在故事的尾声，“我”选择接受了妻子与其他男人生下的孩子，希图通过此种方式在“我”的意识世界里加入爱与宽容即人性因子²的要素，这或将成为“我”日后抵御邪恶的“白色斯巴鲁男人”即兽性因子的决定性力量。至此，《刺杀》内部形成闭环结构³，这意味着村上文学世界建构完成。在随后出版的采访集中，村上兴奋地发出邀请，“如果方便，请来我的洞穴好了！火要烧得旺旺的”（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238）。于是，身处文本之外的我们被村上提供的洞穴风格的故事所吸引，选择杀死“理念”、把握“隐喻”，回归洞穴。这正是村上春树建构村上式文学世界的独特方式。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⁴作为后现代作家中的一员，村上春树以其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准确发现社会病灶，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表达了一个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对于后现代社会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伦理关怀。从1979年的《且听风吟》到2017年的《刺杀》，村上一直在创作中不断反思、校正、丰富着之前的诸多伦理思考，用毕生的精力和热情建构村上式文学世界。当被问及故事在现代是否正在失效时，村上果断回答：“根本没有。”亦如在遥远的洞穴深处讲述的故事一样，在村上看来，“故事在这样的时代反而拥有百折不挠的力量”（川上未映子 村上春树 236-237）。

Works Cited

- 跡上史郎：「かひがひしからぬ『諸君』：世界模型としての村上春樹『騎士団長殺し』」，『近代文学試論』56（2018）：97-111。
- [Atogami, Shiroh. "Easygoing 'Gentlemen': Haruki Murakami's *Killing Commendatore* as a Model of the World." *Kindaibungakushiron* 56 (2018): 97-111.]
- 平野芳信：「村上春樹『騎士団長殺し』論：即身仏／ビーフジャーキー」，『近代文学試論』56（2018）：85-95。

1 本文认为，解喻是运用能指脑概念与所指脑概念在特定伦理语境中对喻体的解构与重构，不同隐喻意义的产生由受喻者所选伦理语境决定。

2 人性因子即人的伦理意识，其表现形式为理性意志。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

3 闭环结构也叫反馈控制系统，是将系统输出量的测量值与所期望的给定值相比较，由此产生一个偏差信号，利用此偏差信号进行调节控制，使输出值尽量接近于期望值。本文用“闭环结构”描述村上所建构的文学世界，认为在村上文学世界中意识与无意识、地上与地下、真实与虚构、过去与现在相互渗透，相互交互，相互影响，共同向善。

4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Hirano, Yoshinobu. "A Study on Haruki Murakami's *Killing Commendatore*: Sokushinbutsu / Beef Jerky." *Kindaibungakushiron* 56 (2018): 85-95.]

井関優花: 「村上春樹作品における<色を持たない登場人物>像について: 『色彩を持たない多崎つくると、彼の巡礼の年』『騎士団長殺し』を中心に」, 『富大比較文学』3 (2020): 1-21。

[Iseki, Uka. "Image of <the Colorless Character> in Haruki Murakami's Works: Centered on *Colorless Tsukuru Tazaki and His Years of Pilgrimage* and *Killing Commendatore*." *Fudai Hikaku Bungaku* 3 (2020): 1-21.]

川上未映子、村上春樹: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村上春樹訪談集)》, 林少華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9年。

[Kawakami, Mieko and Haruki Murakami. *Mimizuku wa tasogare nitobitatsu (Haruki Murakami A Long, Long Interview)*, translated by Lin Shaohu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9.]

Morales, Daniel. "'Killing Commendatore': Murakami's latest lacks inspired touch of earlier works." *The Japan Times*. 1 Apr. 2017. 10 Dec. 2022

<<https://www.japantimes.co.jp/culture/2017/04/01/books/book-reviews/killing-commendatore-murakami-latest-lacks-inspired-touch-earlier-works/#.W0KnAtIzY2w>>.

村上春樹: 『少年カフカ: 村上春樹編集長』。東京: 新潮社, 2003年。

[Murakami, Haruki. *Kafka on the Shore Official Magazine Haruki Murakami*. Tokyo: Shinchosha, 2003.]

——: 《刺杀骑士团长》, 林少華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

[—, *Killing Commendatore*, translated by Lin Shaohu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 『村上春樹雜文集』。東京: 新潮社, 2011年。

[—, *Murakami Haruki Zatsubun-shu*. Tokyo: Shinchosha, 201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口头文学与脑文本”, 《外国文学研究》3 (2013): 8-15。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3): 8-15.]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外国文学研究》5 (2017): 26-34。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清水良典: 「自画像と「父」なるもの——村上春樹『騎士団長殺し』論」, 『群像』5 (2017): 37-46。

[Shimizu, Yoshinori. "Self-portrait and the So-called Father: A Study on Haruki Murakami's *Killing Commendatore*." *Gunzo* 5 (2017): 37-46.]

『日本国語大辞典』縮印版第一卷, 東京: 小学館, 1986年。

Nihon Kokugo Daijiten (Reduction Plate). vol.1. Tokyo: Shogakukan, 1986.